

想象与无偏旁观者:亚当·斯密体系的思想逻辑

潘 坤¹,高力克²

(1.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57;2.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斯密本人计划的“体系”包括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法理学和哲学史,其体系的一以贯之通过想象及无偏旁观者的思想逻辑实现。想象作为哲学史的核心要素,是斯密体系的认识论前提。想象以其应用在道德哲学中的最终产物——无偏旁观者,使人们达成情感一致性,在经济生活中形成具有合宜性的社会化自利,由此呈现斯密体系的内在统一。然而,想象自身的局限以及商业繁荣造成的腐化德性对想象的进一步破坏,给斯密体系带来挑战。不过,斯密仍然在其体系中找到了商业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路径,在法律、道德和美德层面外化无偏旁观者并提升其程度,使无偏旁观者由早期作为第三方公正审判的想象角色,上升为具备全部德性的最完美合宜的理想形象,在同情共感机制的理论框架下克服想象的局限。由此,斯密体系重新完整呈现。

[关键词] 斯密;体系;想象;无偏旁观者

[中图分类号] B82-053;B5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25)04-0166-06

尽管亚当·斯密最终只完整留下了《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但实际上斯密本人有着构建其体系的宏大计划。斯密所计划的“体系”范畴除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外,还包括哲学史和法律与政府的理论和历史。“法律与政府的理论和历史”与《道德情操论》结尾“法律和政府的普遍原则以及不同年代和时期经历的不同变革”一以贯之,代表了法理学在斯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哲学史也“在斯密的体系中占据一显著地位”^①。本文所指斯密体系及其范畴便源于斯密本人所计划的“体系”。从实践层面来看,斯密体系本质上呈现的是伦理和经济、财富与德性抑或理性经济人和理性道德人之间的兼容性问题。该问题最初表现为“斯密问题”,尽管已被证伪,但仍无法充分说明斯密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解决此问题需立足于斯密本人计划的“体系”。

目前,学界关于斯密“体系”问题的认识尚需深入讨论,本文试图从想象及无偏旁观者出发,论证两者何以呈现斯密体系化的思想,为理解斯密体系的一以贯之提供一种较新的阐释视角。首先从斯密体系的学界争论和历史追溯中,考察想象在斯密体系中的地位;其后阐释想象如何从一般哲学到道德哲学,并以无偏旁观者机制呈现斯密体系内部的一致性;继而考察想象的局限性及其对斯密体系带来的挑战;最后分析斯密如何在法学、道德和美德领域通过外化无偏旁观者,克服想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曼德维尔伦理和政治作品的编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4BZX092);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模块化视角下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路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1BGLJ01)。

[作者简介] 潘坤,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高力克(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箱:gaolike@126.com。

^①查尔斯·格瑞斯沃德著,康子兴译:《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6页。

象的局限,重新实现其体系内部的有机统一。通过上述过程,斯密完成其体系的完整构建和对商业社会的全面思考。

一、斯密体系中想象的学界争论和历史追溯

学界对斯密体系中想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想象与斯密体系的关系,第一种观点是,想象是贯穿在斯密整个体系当中的方法^①。无论是同情共感的发生机制、最大限度获利的市场行为,抑或公正评判的法理过程,都离不开想象的运作。第二种观点是,想象是斯密体系的认识论前提^②,即斯密将一般哲学中的想象运用到其他领域。两种观点都将想象作为斯密体系的关键因素,但对于想象究竟如何致力于解决商业繁荣背后的德性问题和正义问题,缺乏深入挖掘。二是学界很少专门论证想象与无偏旁观者的关系^③及其在斯密体系中的作用。无偏旁观者主要出现在斯密伦理学、法理学、美学和修辞学中^④,少见于政治经济学领域。想象与无偏旁观者的关系主要在研究同情发生机制时被提及。两者在斯密体系中的地位仍需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斯密本人的学术生涯及哲学史笔记能够就想象在斯密体系中的地位给出答案。其一,1748年至1751年,斯密首次开设爱丁堡系列讲座,这为展现斯密体系奠定基础。斯密最先讲授修辞学和哲学史内容,期间他对哲学史进行了单独考量,在《天文学史》中完整阐述哲学演进过程,这推进了与牛顿自然科学相呼应的哲学方法的产生。尽管斯密未单独开设哲学史课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史是修辞学的组成部分,“(讲座)材料足以写成一本可以与《道德情操论》……相媲美的著作”^⑤。其二,《天文学史》是斯密哲学史讲座的基础。《天文学史》来自斯密《引领和指导哲学探究的原理》一文。1773年4月16日,斯密与休谟商议《天文学史》出版事宜,指出“包含天文系统的历史……一直流行到笛卡尔时代……其他的散稿……我希望它们不经任何考验就被销毁”^⑥。从斯密对《天文学史》的态度来看,他将《天文学史》视为其所计划的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最终未下令销毁。其三,想象是《天文学史》中的核心要素^⑦,构成斯密体系的认识论前提。在斯密体系中,哲学史“关

①参见 FIORI S., "Smith and Hume on imagination and sympathy", in *Adam Smith and Modernity: 1723–2023*, Alberto Burgio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p. 89–108; FLEISCHACHER S., *On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A Philosophical Compan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1–33.

②参见 GRISWOLD C. L., "Imagination: Morals, Science and Art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Knud Haakonss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2. 格里斯沃德甚至认为,斯密本应完成一本关于想象理论的论著。

③格瑞斯沃德和拉斐尔集中论证过想象及无偏旁观者的道德规范性,即无偏旁观者如何通过想象实现公正的道德审判。参见 GRISWOLD C. L., "Imagination: Morals, Science and Art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Knud Haakonss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8–40; RAPHAEL D. D.,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Adam Smith's Mor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20.

④参见 RAPHAEL D. D.,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Adam Smith's Mor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7, pp. 12–20; BROADIE A., "Sympathy and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Knud Haakonss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58–188; OTTESON J. R., *Adam Smith's Marketplace of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64; MCKENNA S. J., "Fitting Words: Propriety in Adam Smith's Rhetoric and Ethics", in *Scottish Rhetoric and Its Influence*, Lynne Lewis Gaillet (ed),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pp. 57–66.

⑤伊安·罗斯著,张亚萍译:《亚当·斯密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⑥SMITH A.,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p. 495.

⑦想象还贯穿在斯密对语言和逻辑学的论证中。在《道德情操论》(从第三版开始)一篇题为《语言起源》(A Dissertation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的论文中,斯密指出语言形式是一种关于语言和思想形成的推测或自然史,以满足想象为科学依据。《古代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史》中也有类似表达。

照着斯密用以贯穿整个文集的那种行为”^①,而这种行为方式便是想象。体系是一部“想象的机器”^②,“所有的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想象中所作出的发明”(EPS, p. 105)。斯密正是通过其体系中哲学史想象,寻找道德哲学的牛顿式规律,借助想象在道德领域的最终产物——无偏旁观者,实现其思想的体系化。

二、想象:从一般哲学到道德哲学

斯密沿袭了休谟的想象理论,但其运用更加深刻。休谟指出,想象使世界呈现关联和统一的关键在于将事件之间的关系视为因果关系,“记忆、感官和知性都是建立在想象或观念的活泼性上面的”^③。在斯密看来,哲学起源于想象。事物之间的联系通过想象来完成,这种联系十分牢固,以致想象在不同观念的传递中没有任何间断或缺口。哲学体系通过想象发现了“由最重要和最崇高的真理构成的看不见的事物链”(EPS, p. 105),所有这些真理通过我们每天所经历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哲学体系如何通过想象的运作产生呢?随着文明进步,人们通过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形成对哲学和科学的理解,填补想象的空白。斯密时代的科学和哲学是同义的,这一点是想象发挥作用的前提。哲学和科学作为想象的产物,是“连接自然原理的科学”(EPS, p. 45),“减轻自然的寻常或看似脱节的表象所激发的那种奇妙”(EPS, p. 75),由此哲学与科学呈现一个关联的世界。斯密还将自然哲学的想象应用到道德哲学,构建道德哲学领域的牛顿原理。斯密宣称牛顿法“无疑是最哲学的……比其他方法更引人入胜”^④,认为道德领域同样可以按照牛顿的方法。斯密是否在道德领域充分贯彻牛顿方法的连贯性,学界尚有争论^⑤,但牛顿对斯密的影响不应被忽视。

在自然哲学的想象的运作基础上,斯密将想象产生的连贯性思维方式置于道德哲学中。在道德哲学中,想象的实现过程表现为,人们通过想象达成情感的一致性,确保行为的合宜性。在该过程中,无偏旁观者是想象的最终产物。

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都将“旁观者”作为道德判断的来源,斯密明确提出“无偏旁观者”,将其视为同情理论发展的最高层级。人类以想象理解同情或者说共情,通过行为——旁观者的模式考虑他人对共同判断对象的反应,以平衡我们自己的判断和他人可能做出的判断。进一步说,同情想象寻求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和谐的组合,需“以想象其他任何公正无偏的旁观者都会采取的那种方式”^⑥进行道德判断。无偏旁观者是想象出来的内在的人、胸中那个人抑或良心,而不是真实的“外在的人”。假想出的无偏旁观者不仅比现实的旁观者更公正客观,而且是审视自己行为是否得体的唯一镜子。

同情想象的情感一致性的满足映射到经济领域表现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无偏旁观者形成适当的社会化自利,获得自身经济行为的合宜性,实现作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兼容。该过程的实现在

①查尔斯·格瑞斯沃德著,康子兴译:《亚当·斯密与启蒙德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6页。

②SMITH A.,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p. 66. 以下缩写为EPS,引用时随文注明页码。

③大卫·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2页。

④SMITH A.,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5, p. 146.

⑤关于斯密对牛顿方法的运用可参见WORLAND S. T., *Mechanistic Analogy and Smith on Exchange*,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34, No. 2, 1976, pp. 245-257; LINDGREN R. J.,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dam Smith*, The Hague: Nijhoff, 1973, p. 2.

⑥SMITH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4, p. 110. 以下缩写为TMS,引用时随文注明页码。

于,一方面,想象促使自我形成渴望得到他人被认可和赞同的道德需求,这种需求成为经济领域自我改善的动力。他人赞成使人备受鼓舞,他人否定使人深感沮丧,因此,人人希望成为被他人称赞和尊重之人。当人们考虑到旁观者对自己经济处境的认同和否定,便更希望同社会上层一样获得尊重和认可,于是努力改善自身境况。另一方面,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同情共感在无偏旁观者对自爱的偏狭中实现。经济活动中的自爱并不等于完全自利,因为行为者会以自己所意识到的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于是他会“收敛起自爱的傲慢之心”(TMS, p. 82)。在进行市场决策及交易、确定效益最大化时,每个人都有尊重自然的无偏私的内在倾向。此时不偏不倚取得一种有利地位,形成公正判断,这些判断在全社会范围内被视为正义法则的基础,确定在何种程度上获得财富和寻求幸福是合宜的。

通过上述过程,想象以连贯的科学思维达成情感的一致性,实现具有合宜性的社会化自利,该实现过程以无偏旁观者为最终评判标准。由此,哲学史中的想象贯穿在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呈现斯密体系内部的一致性。

三、想象的局限、商业社会的德性腐化与斯密体系的挑战

从一般意义上的同情共感机制来看,想象的局限性在于,人们往往很难做到每次都成功想象自己进入他人世界、实现双方情感的一致,那么便难以在商业实践中权衡社会化自利的合宜程度。由于想象力是有限的、易逝的,同情在旁观者立场上存在虚幻性。随着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实际经历、所处环境和群体身份越来越不同,旁观者预测事情结果的能力就会逐渐减弱。旁观者只有和当事人所处经历和环境越相似、身份越接近,才更有可能产生一致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无偏旁观者的强有力判断具有脆弱性,难以产生长远影响。当无偏旁观者的公正审判不断失效时,想象的限度会强化,于是愈发阻止外人进入自己的道德空间。例如,在道德规则的形成过程中,人们站在无偏旁观者立场上,通过想象将离散的道德经验结合起来,连贯整体的道德规则由此确立。但由于想象的局限性,人们无法在所有事情上达成完全一致的道德判断,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无偏旁观者对同一件事据以判断的道德标准可能也是不同的。基于上述局限性,无偏旁观者在真正理解他人和评价自己时具有不稳定性,同情共感机制易被破坏,并在经济、法治、德性方面呈现出不同特点。

此外,在商业社会的现实发展中,财富的快速增长造成普遍的道德败坏,无偏旁观者作用的发挥存在更大程度的阻碍,加剧了想象对同情共感机制的破坏。对社会高阶层来说,他们能够被认可和称赞不依靠道德情感。在高阶层的生活中,成功往往“取决于无知、专横和傲慢的上层的怪诞、愚蠢的偏爱”(TMS, p. 63),从而产生贪婪奢侈、阿谀奉承、虚伪欺诈等败坏行为。富有商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场机制的制约,他们不仅无需表现出审慎、诚信等品质,甚至可能僭越法律底线,损害公共利益。而社会中下层基于崇拜富贵、蔑视贫穷的心理倾向,不仅不会厌恶富人和权贵的不德和不义行为,其自身在追求财富时也会舍弃德性。斯密指出,即使社会中下层人士最终达成了财富和地位目标,终其一生“被辛劳和疾病所消耗……心灵被他想象的敌人的不公正所造成的无数伤害和失望的记忆所折磨和困扰”(TMS, p. 181),最终发现“财富和伟大不过是实用的装饰品”(TMS, p. 181)。此外,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中下层的智识能力和思想水平,他们无法发挥理解力,难以对个人义务以及国家的重大利益作出判断。综合以上情况,人们在追求财富和自我改善过程中,面临德性、情感、心理和智力的层层腐化。而在诸多有害后果的影响下,人们愈加难以想象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无偏旁观者,造成想象的运作机制被不断破坏。

无疑,想象的局限性使自利行为的不合宜性存在可能,并且随着财富的快速积累,商业社会普遍的道德败坏不断破坏想象的作用,最终导致情感的一致性完全断裂,造成财富之路和德性之路的背离。这样看来,斯密体系似乎遭到了阿喀琉斯之踵。

四、无偏旁观者重构、想象局限的克服与斯密体系之完整

斯密深刻谴责商人孜孜不倦追求财富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要求警惕财富在保障幸福生活方面的虚假性。如此来看,商业社会的所有优势似乎微不足道。如果是这样,斯密为何还要为商业社会辩护呢?换言之,他如何看待其体系内部的挑战?只有解答该问题,才能理解斯密体系何以一以贯之。实际上,斯密重新构建了无偏旁观者理论。无偏旁观者通过在法律、道德和美德层面的外化和程度提升,超越了前期作为第三方公正裁决的想象的旁观者,最终成为具备全部德性的最完美合宜的理想无偏旁观者,在同情共感机制的理论框架下克服想象的局限。由此,斯密体系得以重新完整呈现。

第一,伟大的立法者和政治家等明智有德之人作为理想的无偏旁观者,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防范市场的不义行为。法律系统因其公正性、稳定性、完备性,克服想象的有限性和短暂性。由于当事人和旁观者之间的距离,个人的理性判断和实际制定法律的权力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法律也总是保护富人财产不受穷人侵害。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法律产生后,其有效性应如何确保?斯密认为,司法体系是克服想象在法学领域的局限、保障无偏旁观者保持公正独立的典型外化,以确保法律的稳定性和神圣性。司法是国家政治管理中的核心环节。它奠定了“稳定的权利结构”^①,平等地保护最不富裕人与最富裕人的权利。在斯密之前的法学思想家都没有将无偏旁观者作为法理学的判断原则。格劳秀斯被视为法理学领域的典范,但他侧重于从人性出发提出连贯的自然法体系^②,休谟则拒绝将公正询问者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只有斯密强调,法理学的普遍有效性存在于法治总框架下超越一切相对主义、对特定个人具有普遍规范的内在司法规则。

第二,贤明有德之人引导人们不断提高内心无偏旁观者的程度,提升个人德性,在这一过程中,道德规则具有普遍规范性,仁慈、友爱、审慎等美德发挥重要作用^③。斯密强调,当人们在特定背景下一致地赞同某一特定行为时,这种行为最终就会被认定为是值得称赞的。这正是斯密在《道德情感论》第六版中大幅增改的主要内容。道德规则在克服想象对道德情感的偏差上具有普遍规范性,人们出于自身的义务感去遵守的普遍道德准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TMS, p. 162),“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尊重这些重要的行为准则,人类社会就会崩溃”(TMS, p. 163)。

此外,无偏旁观者以一定的美德作为合宜性标准,才能避免为实现善的最大化牺牲个人。斯密未拒绝作为私德的仁慈在法律审判上的作用。在惩罚的适当性问题上,无偏旁观者在考量施害者的惩罚程度时应允许仁慈的介入。斯密拒绝接受纯粹功利主义,主张实现对每个个体的平等尊重。为让他人受益,增加社会总体满足感,却使自己忍受痛苦,这绝不是斯密本人所认可的。也正是通过提升内心无偏旁观者的层级,人们“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帮助”(TMS, p. 85),审慎、公正、节俭、诚信、合作等品质(TMS, p. 63)不断被鼓励。

第三,在前两点的基础上,理想的无偏旁观者最终成为最完美合宜者,最大程度上缓和腐化的德性对想象的冲击,重新实现想象的情感一致,使商业社会达到完全合宜的理想状态。此时,人们在践行美德时总会在自我评价方面表现谦卑,使得财富造成的虚假幸福能够与值得认可和赞同的人性渴望相互平衡,以此弥补因过度追求财富而带来的身心损耗。由于人们清楚自己的辛劳会因益于他人而最终受益于自己,于是,人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比其他人更重要”(TMS, p. 83),同时不轻视他人,认为他们“在各方面都和自己一样重要”(TMS, p. 83)。如此,人们不仅在自我良心的认同下体

①LIBERMAN D., "Adam Smith on Justice, Rights, and Law",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Knud Haakonssen(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41.

②GROTIUS H.,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5, p. 38.

③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强行约束德性,斯密严厉反对德性需得到强制矫正。

会到帮助他人的快乐,也因此获得实际回报。既然个人通过努力改善自我境况的行为得到了回报,其体力、智力和德性问题也进一步得到解决。

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控制是使自己成为完美德性之人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得到最完美的自我控制的支持,将无法总是尽到自己的义务”(TMS, p. 237)。自我控制本质上是利他的社会美德,以内心旁观者形成的对自己情感适度的合宜性产生于对他人情感更大限度的敏锐性,而非对他人更大程度的麻木。斯密没有主张对所有情绪麻木冷漠,而是认为理性经济人的正当目标是以一种无偏旁观者和自我都认可的方式调节情感。随着内心的无偏旁观者同情共感的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大,它成为完美同情者和至高的德性代表,最终,人人具有最完美德性,获得最高程度的自我控制,“既能最完美地驾驭自己原始的自私感情,又能最敏锐地感受他人原始的、同感而生的感情”(TMS, p. 152),社会也处于一种完全合宜的理想状态。

基于无偏旁观者的层级,斯密尽可能全面考察旁观者特有的冷静和反思的情感,由此做出的道德判断内在地包含了对遵守道德规则和践行美德的理性反思。当然,现实中未实现和无法实现的欲望总会阻碍人们追求幸福,普通人和哲学家、科学家等在德性方面也存在差距。但斯密更愿意接受的事实是,虽然商业社会不能保证人们获得完美幸福,但致力于不断促进幸福。

五、结论

斯密真正关心的是身处商业社会中的普通大众应如何过上美好生活,并在其体系内部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即通过想象及无偏旁观者的运行,在道德、正义、经济、美德、政治等层面为探求人们的真正幸福提供诸多可能性。对此,我们进行如下总结:其一,斯密最终开启了想象这一人类社会科学新路径。想象路径的开辟揭示了斯密试图构建的一种整体性的、普遍适用的社会科学体系,人性、自爱、正义、仁慈、友善等要素以合宜的社会化方式内在统一于该体系中。该路径纠正了那些以抽象数学模型为洞察人类行为的最佳方式的认识,而这些在今天几乎都被忽视了。其二,无偏旁观者作为想象在道德领域的最终产物,是解决斯密体系问题的核心要素。作为一个有效的无偏旁观者,能够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有效同情及其熟悉的合宜性标准,最好地平衡效用需求与对社会生存至关重要的正义需求,使大众最恰当地融合于所处社会的正义规则、社会便利和公共德性之中。无偏旁观者实践对人类经验来说尤为真实。其三,在想象与无偏旁观者的思想逻辑下,斯密体系呈现的是一个有序、守法、客观、友善的现代社会。在这一现代社会中,理性经济人理应是富有同情共感的好人,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利但不以牺牲德性为代价,否则现代社会将面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更可能出现道德沦丧、礼崩乐坏。

“相信斯密的道德理论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中间地带”^①。尽管斯密体系难以对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与伦理、市场与法治、社会与国家等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袁朋伟]

^①RASMUSSEN D. C., *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Commercial Society: Adam Smith's Response to Rousseau*, State Colleg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7.